

跨文化交际学理论反思三题^①

纪玉华 焦敬东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在跨文化交际学理论研究中, 权势关系还是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因素。另外,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探讨中还存在着两个误区, 即表征主义交际观和对文化差异进行本质性概括的倾向。本文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并加以反思, 认为: 人际交往是否有序和模式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际双方的权势关系; 表征主义交际观忽略了交际是说话人共同建构的一种社会行为这一事实, 把交际假设成无权势和利益参与其中的“纯净”过程; 对文化差异进行本质化概括的倾向有损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科学性。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学; 权势关系; 表征主义; 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720(2007)04-0242-05

1. 引言

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在国外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我国也有近 30 年的历程了。但国内外该领域的主流理论大多注重分析语言和文化中的差异, 往往把语言和文化差异视为描述角度和能力的差异, 这实际上就忽视了跨文化交际的“社会行为”之本质, 将其假设为无权势和利益参与其中的“纯净”过程。此研究路径之局限性近几年正越来越引起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者的注意(连淑能, 2007)。在跨文化交际学理论研究中, 权势关系还是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因素。另外,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探讨中还存在着两个误区, 即表征主义交际观和对文化差异进行本质性概括的倾向。本文拟就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的权势问题、表征主义交际观和对文化差异的本质化概括这三个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加以反思。

2. 权势问题

权势问题在跨文化交际学理论研究中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不过, Berger (1994) 曾提醒过研究者注意人际交往中与权势有关的因

素, Reid 和 Ng (1999) 也就语言、权势和群际关系等问题做过研究。Gudykunst (2005) 建议跨文化交际理论家在考虑权势问题时利用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注意到: Shi-xu 和 Wilson (2001) 写的“意志与权势: 激进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与教学初探”一文, 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权势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尖锐地指出: “尽管‘全球化’这样的话语在时下如此流行, 但当今的跨文化交际都是发生在更广阔的、同时又是具体的、经过历史演化的(葛兰西式的)霸权语境中的。这种霸权特指存在于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中心与边缘、帝国与殖民地, 以及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之间的控制、剥削、排斥和歧视的关系。”因此, 他们提出, 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状况的分析可以从不平衡的权势关系入手。在这种不平衡的权势关系中, 一个群体被另一个群体所控制, 因为某些群体或个人可以获得权势资源, 而其他群体或个人却得不到 (Shi-xu & Wilson, 2001: 82)。

跨文化交际学理论对权势问题的忽视与主流的人类交际观念有关, 它认定交际是一个有序的过程, 即人际交往行为是有一定的秩序和特定模式的, 而非不可预测和无序的。“交际者

对意义以及符号使用行为的共识都依据一系列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交往规则。这些规则使个人和集体的目标在交际过程中得以实现。”(Chen & Starosta, 1998: 24) 这里, 我们以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厨房辩论”为例来分析和反思这种主流的交际观念。

1954年, 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的防御分析家对此怒不可遏, 他们说人造卫星将彻底破坏北约的预警防御系统, 并把它称为“有史以来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在当时紧张的冷战局势中, 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苏联同意美国在莫斯科举办一个展览。这一展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让我们看到了在赫鲁晓夫和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之间的一场自发的幕后政治辩论。当时展览中最吸引人的的是一个典型的牧场风格的美国住宅, 里面有各种不为苏联人所知的家庭用具。在走过展厅时, 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之间的随意交谈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尼克松对赫鲁晓夫大谈在美国生活的好处, 而赫鲁晓夫则予以还击, 这一镜头之外的交锋后来被称为“厨房辩论”(http://watergate.info/nixon/1959_nixon-khrushchev-kitchen-debate.shtml)。请看下面的对话:

Nixon: This is our newest model. This is the kind which is built in thousands of units for direct installations in the houses. In America, we like to make life easier for women ...

Khrushchev: Your capitalistic attitude toward women does not occur under Communism.

[参考译文]

尼克松: 这是我们最新研制的机型。它由上千个单元组成, 可以直接安装在家里。在美国, 我们喜欢让妇女们生活得更轻松些……

赫鲁晓夫: 你们对待妇女的这种资本主义态度在共产主义社会是行不通的。

显而易见, 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权势关系影响着交际的有序性并导致交际走向的不可预见性。首先, 我们注意到赫鲁晓夫如何迅速地识别出尼克松陈述中的意识形态假设。在赫鲁晓夫看来, 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 妇女就该在厨房里干活, 而男人则应在外工作。其次, 我们注意到赫鲁晓夫并不愿意遵守“创造共同意

义和行为的规则”。他并不合作, 而且实际上还相当傲慢。这场辩论的背景是: 当时的苏联由于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突然成为两大强国中更强大的一方。可以说赫鲁晓夫故意曲解尼克松的意思, 尼克松的意思其实是说厨房用具可以让妇女们在厨房里的工作更省力。一个合作的听话人会接下去讨论这些用具如何或者是否会使妇女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 从而让谈话有序和模式化。但因为赫鲁晓夫针对尼克松话语中的假定前提在政治上的不正确性而突然发难, 当时这样的讨论是不可能进行的。我们认为, 他们谈话中的无序性是当时特殊的权势关系在起作用的结果。事实上, 在整个的“厨房辩论”中, 赫鲁晓夫始终居于支配地位并且语气傲慢无礼, 整个谈话可以说是无序的。再看下面的对话:

Khrushchev: You're a lawyer for Capitalism. I'm a lawyer for Communism. Let's kiss.

Nixon: All that I can say, from the way you talk and the way you dominate the conversation, you would have made a good lawyer yourself. What I mean is this: Here you can see the type of tape which will transmit this very conversation immediately, and this indicates the possibilities of increasing communication. And this increase in communication, will teach us some things, and you some things, too. Because, after all, you don't know everything.

Khrushchev: If I don't know everything, then you know absolutely nothing about Communism, except for fear!

[参考译文]

赫鲁晓夫: 你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律师, 我是共产主义的辩护律师。我们来亲吻吧。

尼克松: 我只能说, 你谈话的方式和你掌控谈话的方式, 都说明你本来就是个好律师。我想说的是: 你眼前的这种磁带, 可以把我们的谈话立刻播放出去, 这表明我们增进交流是完全可能的。增进交流, 可以让我们学到一些东西, 也可以让你们学到一些东西。因为, 毕竟你们也不是样样都懂嘛。

赫鲁晓夫: 如果我不是样样都懂, 那你对共产

主义,除了害怕之外,也是一窍不通!

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对尼克松的故意曲解,他实际上是知道尼克松的意思的。尼克松希望对方讨论国际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由于对方的傲慢和挑衅,他失败了。因此,我们认为:人际交往是否有序和模式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际双方的权势关系(纪玉华,2007:209)。

3. 表征主义交际观

我们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表征主义交际观。这个观点把交际定义为“描述或报道现实,从而提供信息,表达‘意义’”。(Shi-xu & Wilson, 2001: 78)根据这个观点,交际的目的是让听者或读者理解所表达的意思。该交际观还假设:如果交际不是描述性的,那么理解和误解就无从谈起了。这种表征主义的交际观实乃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统天下的结果。实证主义认为,将语言、文化与交际、社会关系和权势斗争联系起来,则很难归纳出科学、客观的交际学理论。该交际观把交际看成是信息发出和接收的简单过程,把语言和文化差异视为描述角度和能力的差异,这就忽略了交际的“社会行为”性质,把交际假设成无权势和利益参与其中的“纯净”过程。

Shi-xu 和 Wilson (2001: 77)指出:在主流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和教育中,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概念,即“跨文化交际能力”(cross-cultural competence)和“误解”(misunderstanding)。“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对相关的语言和文化系统所具有的知识 and 技能;“误解”指的是听话人或读者基于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视角,对于说话人(或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的不准确或错误的心理表征。与此相联系,跨文化交际主流理论大体上基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假设。一方面,跨文化交际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个人对相关的语言和文化系统所具有的知识 and 技能,即“能力”。另一方面,交际的媒介,即语言,包含并传达客观的意义。因此,只要群体成员拥有同样的信息并能使用同一种语言交换这些信息,就可以达成一致和理解。

反过来,如果成员处理的输入与输出信息有语言或文化上的差异时,就会产生不一致或交际困难。

这些研究者没有认识到,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不愿意承认:交际并不仅仅是交流客观的意义以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共同建构的行动(或互动),在这个互动中,权势一直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Shi-xu & Wilson, 2001: 77)

因此,在交际中产生的那些模式化观念(stereotypes)并不仅仅是不准确的心理感知,而是与控制 and 支配他人的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群体间或文化间的冲突之所以产生,或协同努力使某一目标得以实现,并不单单是由于对语言 and 文化的了解 or 不了解,更重要的是权势 and 政治方面的原因。(Keesing, 1991: 50) Shi-xu 和 Wilson (2001: 78)以北爱尔兰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北爱尔兰的两个社会文化群落之间,可以说具有近乎理想的交际条件:它们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历史,而且彼此了解。但它们之间的交际却不比其他任何的人类交际更容易。

Shi-xu 和 Wilson (2001: 79-80)对主流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说:把理解失误或交际失误归因于特定的语言 or 文化结构,甚至个人的能力不足,这实际是在维护现存的不平等的权势关系(包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权势、文化利益、商业动机等),至少是掩盖了(与所谓的误解、交际失误 and 挫折联系在一起的)为权势所驱使的支配 and 歧视行为,并使这些支配 and 歧视行为合法化。

4. 对文化差异的本质化概括

在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和理论探索中,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把文化纳入一般人际交往理论中,重点是建立种种模型 and 理论来解释发生在这个星球上的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相似文化的人之间 and 同一文化内部的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面对面 or 书面的交际。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学者们做了许多尝试,提出了许多理论,但其中也有不少臆测。

早期的研究中有一些是交际内容的分析和

人种志分析。在这种研究中，文化被认为是既定的。分析家们在研究说话者和他们的话语时，先假定这些说话人是演绎出来的民族文化的典型。Prosser (1970) 就是一个例子，他编写了两本书，探讨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各国领导人的修辞法。

在做这种类型的研究时，我们最好不要把文化看作是既定的。可以假定，文化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记住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把跨文化交际研究看作是动态的，而非本质先于存在的。如果研究的对象是交际事件或内容，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当时的文化的影响，而不应对其之前或之后的文化做出假设。研究者应该寻求对事件的有根据的、有具体情境的和个人化的理解。(Starosta & Chen, 2003: 7) 我们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及其基础的问题。Chen 提出远东的宇宙观是整体的，“它把宇宙看作是一个整体，其中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过渡过程，它没有作为根基的固定物质，所有的组成成分都是相互联系的，并朝着宇宙的大和谐方向运动。”应用于交际时，“这种变动的过程涉及一种启蒙精神，它让人类有尊严地交际，并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网络中相互影响。”据此，他总结道：“人类交际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相互依赖的过程中建立和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Starosta & Chen, 2003: 8)

基于此，Chen 看到在人际交往中东方人和西方人有三个不同之处：首先，对东方人而言，“和谐是交际的目的而非手段。其次，交际被看作是交际者在动态的、相互依赖与合作的过程中适应和重新定位自我的能力，而不是交际者力争使交际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的能力。第三，人际交往易受伦理的影响，这要求交际者有与对方合作的责任感。这种合作不是基于交际者的富于策略的言辞，而是基于对对方的真诚关切。”(Starosta & Chen, 2003: 8)

一旦承认文化是瞬息万变的，Chen 的前提和他所说的差异就必须引起质疑。例如，世界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两架飞机撞到世贸中心的双塔的那一刻就发生了。Chen 是否认为西方人不把宇宙看作是

一个整体？他是否认为西方人或多或少是反对交际和谐的？或者认为他们根本不关心与他们交际的另一方？

自然，在这个语境中所谓的东方哲学指的是儒家思想。Starosta 问 Chen “为什么在描述中国人的交际时总是更强调儒家思想而不是其他思想？有没有人（比如说某个专制的政府）从中受益？”这个问题源于之前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对文化的某一种描述会被拔高，从而凌驾于其他所有观点之上**，以至于传统的研究者用被赋予了特权的声说话，却意识不到自己在这样做？”(同上：16，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我们的看法是：这个前提需要重新加以审视，这是因为儒家思想在近百年来已不再是中国文化语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它对当今的中国公民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文化成员之间的交际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里，我们不禁想到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相统一的实践哲学观。葛氏认为：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某个哲学家的哲学，不是某个知识分子团体的哲学，也不是人民大众某一群体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葛氏称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哲学为“内在论哲学”(葛兰西，1990: 27)，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相统一。作为美国哲学基础的 WASP (即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族、清教徒) 的观念也由于美国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不断增加而日渐式微。所以，与加利福尼亚人进行的谈话或谈判会跟与新英格兰人的交谈完全不同，正像跟上海人交谈和跟贵州人交谈完全不同一样。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带来的交际的迅捷性和信息的易得性，有助于我们避免根据甚至只是一小时前的旧知识或旧信息做出假设。因此，交际是受具体情境和环境制约的；客观因素必须与主观因素结合起来，才能让我们了解个人的立场。在跨文化交际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差异始终存在，并且在持续地变化着。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对文化差异进行本质化概括是不科学的。

5. 结语

本文对上述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反思, 特别提醒研究者应充分重视跨文化交际中的权势关系问题, 通过分析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一场激烈辩论来说明: 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权势关系影响着交际的有序性并导致交际走向的不可预见性, 人际交往是否有序和模式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际双方的权势关系。关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两个误区, 即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表征主义交际观和对文化差异进行本质化概括的倾向, 本文认为: 表征主义交际观把交际看成是信息发出和接收的简单过程, 把语言和文化差异视为描述角度和能力的差异, 这就必然忽略了交际是说话人共同建构的一种社会行为这一基本事实, 把交际假设成无权势和利益参与其中的“纯净”过程。本文还指出: 忽视文化的变动性, 对文化差异进行本质化概括的倾向有损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科学性。

注释:

①本研究属 2006 年度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 2006B2125), 亦是厦门大学 2007 年文科创新团队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 Berger, C. R. Power, dominanc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 In

M. Knapp & G. Miller (Eds.), *Handbook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2nd ed.) [C].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4. 450-507.

[2] Chen, G.-M., & Starosta, W. J.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 Boston: Allyn & Bacon, 1998.

[3] Gudykunst, W. B. 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二) [J]. 赵晶晶, 秦筠译. 中国传媒报告. 2005, (2). <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9191>, 2005-08-03.

[4] Keesing, R. M. Asian cultures? [J]. *Asian Studies Review*. 1991, 15(2). 43-50.

[5] Prosser, M. H. The rhetoric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In M. H. Prosser (Ed.) *Sow the Wind and Reap the Whirlwind: Heads of State Address the United Nations* (Vols. 1 & 2) [C].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0. 1-17.

[6] Reid, S., & Ng, S. H. Language, power,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99, 55(1). 119-139.

[7] Shi-xu, & Wilson, J. Will and power: Towards radic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edagogy [J].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01, 1(1). 76-93.

[8] Starosta, William J. & Chen, Guo-ming. "Ferment," an ethic of caring, and the corrective power of dialogue [A]. In W. J. Starosta & G.-M. Chen (Eds.), *Ferment in the Intercultural Field: Axiology/value/praxis* [C].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3. 3-23.

[9] 葛兰西. 实践哲学[M]. (徐崇温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9] 纪玉华. 跨文化交际研究与教育中的批评性话语分析[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10] 连淑能. 《跨文化交际研究与教育中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序 [A].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上接第 221 页)

derivation[A]. In Emily Curtis et al.(ed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ixteenth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C]. CSLI Publications, 1998, 49-63.

[4] Boskovic, Zeljko. On multiple wh-fronting[J]. *Linguistic Inquiry* ,2002, (33):351-383.

[5] Chomsky, Noam. Conditions on transformations [A]. In Anderson, Stephen R. & Kiparsky Paul (eds.) *A Festschrift for Morris Halle*[C]. New York: Holt, Reinhart and Winston, 1973, 287-307.

[6] Chomsky, Noam. A minimalist program for linguistic theory[A]. In Hale, Kenneth et al.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ssay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Sylvain Bromberger*[C].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3, 1-52.

[7] Chomsky, Noam. *The Minimalist Program*[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8] Chomsky, Noam.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A]. In Roger Martin et al.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C].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89-155.

[9] Chomsky, Noam. Derivation by phase [A]. In Michael Kenstowicz (ed.)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C].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1, 1-52.

[10] Huang, J.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in Grammar*[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2.

[11] Freidin, R. *Foundations of Generative Syntax*[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2.

[12] Radford, A. *Minimalist Syntax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M]. Cambridge: CUP, 2004.

[13] 孙晋文, 伍雅清. 双宾语结构与句末附加语[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 (4): 257-263.

[14] 沈家煊. “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J]. 中国语文, 2006, (4): 291-300.

[15] 温宾利. 当代句法学导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